

第1辑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第一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第一辑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人人出版社印刷厂排版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¹/₈印张 232千字

1980年12月第1版 198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200册

统一书号: 11190·054 定价: 1.05元

限国内发行

编 者 的 话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是为了满足近代史研究和教学工作者以及广大史学工作者的需要而创办的，目的在于及时介绍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情况，了解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动态，沟通中外学术交流。

近年来，在中国近代史这个学术领域内，国外的研究工作发展较快。不少人在研究中提出了新问题，发表了新的见解，引用了重要的新资料；一些我们还未涉及的问题，国外也有了较深入的研究；国外还不时对我国近代史研究上的某些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进行商榷或争论。凡此种种，都需要我们及时了解，以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活跃学术空气，促进研究工作的发展。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内容，以论文和专著选译（选译其中有重要意义的章、节或部分内容）为主，同时也酌收书评、学术动态、以及有重要价值的短篇资料和回忆录等。《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暂定每年出两辑，每辑二十万字左右。所收文章，主要看其是否有新观点、新资料，或新进展，至于内容与观点正确与否，则不一定要求。

目 录

1	英俄瓜分中国的协定 (1899 年).....	A·波波夫 李嘉谷译 林荫成校
31	隐忍的限度.....	克拉伦斯·B·戴维斯 李丹阳译 谢明鹗校
47	明治时期日本对华态度 的一页：小村寿太郎研究.....	冈本俊平 沈予译 赵明杰校
76	英帝国主义与辛亥革命 (1911—1913).....	П·И·奥斯特里科夫 朱宗震译 陶文钊校
114	西原借款的基本设想.....	波多野善大 朴成昊译 邹念之校
146	中国边境上的事件： 1911 年的外蒙古.....	托马斯·E·尤因 康右铭译 吴民伟、沈自敏校
166	1911 年后日本陆军的对华 政策——是分歧还是分工？.....	坂野润治 黄光域译 吕浦校
176	1927 年国共分裂后共产国际关于 中国革命战略的一场争论.....	理查德·C·索顿 林 海译
203	我与孙中山的两次会见.....	Г·维经斯基 江海译 李玉贞校

- 207 国民党政权与上海资本家
(1927—1929).....帕克斯·M·小科布尔
曾学白译 吕浦校
- 235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
中国战线.....石岛纪之
彤宇译 傅中午校
- 254 海兰泡惨案纪实.....利奥·多伊奇
吕其苏译

书 评

- 270 《红色档案》杂志篇目索引
编者序.....M·C·谢列兹涅夫
刘存宽译
- 277 介绍一本关于辛亥革命与孙中山的著作.....C·齐赫文斯基
丁如筠译 邹宁校
- 281 日本和西方的近代中国研究
——彼此更趋接近.....R·苏莱斯基
黄光域译 吕浦校
- 286 《十八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
(1700—1725)简介.....李玉贞 杨诗浩

英俄瓜分中国的协定(1899年)

——A·波波夫

译者按：这是一篇资料性的学术论文，发表于苏联《红档》杂志 1927 年第 6 卷(总第 25 卷)。本文引用了至今未发表的俄国外交档案，为进一步研究十九世纪末叶沙俄的侵华政策与英俄争夺中国的历史，提供了重要史料。

在沙皇外交部早已公布的《橙皮书》(《关于 1895—1905 年远东事务的条约与外交文件汇编》)中，发表了英国政府给中国总理衙门的一份照会。^①其中宣称，英国认为中国的扬子江地区保持中国占有，“以保障贸易的自由和发展”是至为重要的。照会同时表示相信，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中国将永不割让毗连扬子江诸省领土给“其它任何大国”。中国总理衙门复照，^②允诺了维护本国领土资源不受侵犯的要求。

英国出来维护中国的完整和不受侵犯，初看有点奇怪，不久就十分明白了。

众所周知，这时沙皇俄国也十分警觉地维护中国的利益，其警觉程度绝不亚于英国，并异常起劲地保卫中国免受日本与德国的

① 1898 年 2 月 9 日的照会。见上述《汇编》第 297—298 页。(此注及下一注，原在日期后面括号注有公历日期，是作者之误，查原日期已是公历，故将括号内日期删去。——译者)

② 1898 年 2 月 11 日发出。见《汇编》第 297—298 页。

侵略,为此,它不惜采取一切它认为必要的措施,甚至获取黄海沿岸的不冻港。^①

由于两大国都想取得为这个如此富有吸引力而又这般虚弱的中国效力的优先权,自然就引起了一场竞争。竞争结果使双方都感到满意。那本1906年就已出版的《橙皮书》的读者,可以满意地证实,这两个互相揪住不放的竞争者在1898年内的种种不顾一切的行动,到1899年初业已通过友好地互换照会而结束了。互换照会本身说明两个大国已经取得了充分的相互谅解。^②

英俄之间在这种自身需要的相互谅解基础上缔结的协定,在俄国和英国的非官方著作中已公认为是划分在华势力范围的协定,俗称“瓜分中国”的协定。

沙皇外交部能够把上述互换照会的举动与达成“势力范围”协定等同起来,并且不顾当时流行的外交术语的陈规,而给存放有关往来公函的案卷标上这样的标题,真是难能可贵的。^③

这个案卷主要收存有关建筑山海关——牛庄铁路这一局部问题的往来公函。由于有了上述总协定,在这个局部问题上必然也能达成协议。这个协议记载在照会中。这些照会同样早在沙皇时代就已公诸于众,人人皆知了。^④

划分在华势力范围的俄英协定具有明显的帝国主义性质,这一点甚至对《橙皮书》的读者来说也是不言自明的。保存于对外政策档案馆中的该问题的往来公函,未必能够在这方面补充什么实质性的新材料。

然而这些往来公函中有一系列至今尚未公布而值得重视的文件。这些文件回答了谁是协定的创议者,阐明了协定签订以前的

① 见《红档》第14卷第1—8页。

② 见《汇编》第358—359页。

③ 原标题是:《关于同英国缔结的铁路协定。势力范围。》

④ 见《汇编》第358—359页。

谈判过程和外交斗争，并顺便描述了当时的国际形势。^①

正当俄国政府同中国谈判修筑南满铁路，以作为中国订立新借款的条件时，(两国)内阁开始了意见交换。詹姆士内阁是谈判的发起者。如所周知，那时詹姆士内阁特别苦于“光荣孤立”的境地。当时在近东问题上孤立的英国，同法国有着强烈的磨擦；法国力图创建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侵占其能够侵占的一切地区(印度支那、暹罗、中国、马达加斯加、上尼罗河、尼日尔河下游)。法国又同意大利缔结了通商条约，改善了自己的国际环境，而它在中非同英国发生冲突后，正同德国磋商英国威胁的问题。德国企图攫取葡萄牙领地，作为它在非洲大陆上的殖民地，因此同英国处于敌对地位，它拟订的海军法案，也使伦敦政界惶恐不安。

国际总形势就是这样。在此情况下，英国在远东直接面临着俄国的威胁——在朝鲜安插军事顾问，并伴随满洲铁路干线同中国铁路的连接，逐渐在满洲站稳脚跟。

英国驱使日本在朝鲜排除俄国的威胁，而在中国境内，它指望同俄国帝国主义达成亲善协议。英、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害冲突，首先发生在中国政府着手修筑天津——山海关——牛庄铁路这个问题上。

① 必须指出，如果说俄国公布的东西仅限于转述协定文本，那末英国公布的东西同样未显出任何完整性与系统性。协定缔结之后，俄国驻伦敦大使馆参赞就立即提醒道：“有关这个问题的往来公函，象有关牛庄铁路问题的往来公函一样，现在还未公布；这些往来公函中必然有许多是这样的公函，它们表明英国政府的活动是很不体面的，于是英国政府十分自然地要竭尽全力推迟公布这些文件”(1899年4月28日雷萨尔<Лессар>的电报，第32号)。当有关往来公函的《蓝皮书》《中国第1号(1900年)》公布时，俄国驻伦敦大使就指出，公布这些公函乃是(英国)政府对国会各党团提出的种种厌烦问题的迫不得已的回答。

这位大使转而对英国政府公布的材料作批评性评论时写道：“一般说，英国政府的出版物是非常粗糙的——毫无条理的文件汇集。但从来未必有象这一次那样，在一本《蓝皮书》中拼凑没有任何联系的这么多杂乱的材料。多半是，外交部一心想着别的事情，未努力使中国问题专家便于了解英国在这个国家的活动。”(1900年3月29日斯塔尔<Стааль>的电报，第25号)。

修筑从山海关深入满洲到达沈阳和吉林的铁路方案，于九十年代初就已拟成。中日战争以及由此引起的财政困难，阻碍了清政府实现这一方案。到俄国修筑中东铁路时(即到1897年年中)，中国总共只敷设了从山海关到中后所小镇的六十四公里铁路线。那时中国对俄国并不特别友好。1897年7月19日^①发布了中国皇帝的谕令：迅速展拓此路，与中东铁路连接，且责成北方铁路督办胡燏棻办理。^②后者与英国汇丰银行过从甚密。英国人金达(C. W. Kinder)被委派直接主持铁路的建筑。

俄国驻北京外交代表对总理衙门准许英国人在满洲建筑铁路表示不悦。总理衙门起初模棱两可地作了回答。但是，当总理衙门陷入困境时(1897年11月14日^③德国人占领胶州[湾])，总理衙门对自己的专门保护人——俄国作了让步，答应在铁路建筑事业上，山海关以北的铁路，除俄国人外，将不准任何外国人参与。此外，中国由于向道胜银行订立总数六十万两的两笔借款，而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因一时的情况不得不让步的中国政府，等候着有利时机以收回所作的让步，随时准备不履行刚才这些庄重的义务。而英国银行界也绝不肯放弃自己的立场，金达继续静候着自己的任职。

众所周知，1897年12月2日^④俄国用其分舰队的船舰占领旅顺口之后，正设法缔结租借条约，因此，在中国问题上俄国的外交行动变得特别殷勤和温和。正如高等文官维特(Витте)起草的一份

① 此日期是俄历，即公历7月31日。本文所用日期一般为俄历。——译者

② [上谕，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初三日(俄历1897年7月19日)]谕军机大臣等：前据御史李念慈奏，津榆铁路请仍归官办，……兹据奏称，……津卢铁路系顺天府尹胡燏棻承办，现在工将告竣，若著将此路(津榆铁路)责成该府尹接续办理，一切委员工匠人等，均系熟手；……即著照所请行。胡燏棻当悉心筹画，覈实经理，逐渐展拓，以竟全功。将此谕令知之。〔德宗实录，卷407，页2〕——译者

③ 此日期为公历。原文日期为11月26日，是作者笔误。——译者

④ 原文误为俄历12月4日，予以改正。——译者

奏折所说,①“今年1月14日外交大臣与财政大臣磋商了借款问题的今后方针”,并得出结论:“一、目前应该继续以原先的程序进行借款谈判,甚至应该授权巴甫洛夫(Павлов)②声明,假如中国政府接受我们的全部借款条件,我方准备按照1895年的借款比值提高借款比值,但现在还不规定提高的幅度。下一步借款谈判可以不受大臣们的非通过俄国不可来订立借款这一愿望的约束,但要力促对方按照以下意图与英国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协议。二、在目前政治情况下,如由英国订立借款,作为借款条件,英国政府规定扩大中东铁路租让,即为中东铁路干线到大连港支线提供租让的条件下,容许建筑和经营这条铁路,那么应当认为俄国的利益就充分满足了。在外交大臣和财政大臣看来,一旦俄国决定永久保持旅顺口为军港,而大连湾为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和在平时时期向全世界开放贸易的商港,那么有了上述第二条,俄国的利益就能得到维护。”

中国债权人的角色对于自身需要信贷的俄国是没有太大吸引力的,在有利的条件下把贷方的角色转让给英国,在俄国外交方面看来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可取的。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Муравьев)伯爵赞同财政大臣的论据,他写道③:“一些资料表明,阁下关于中国借款问题最终趋势的推测,快要成为现实了。这种情形,加上中国政府就被迫拒绝英国的建议一事向伦敦内阁所作的声明,正中下怀,看来,我们从这个问题的现状中获取种种政治利益的时候来到了。为此,我们不妨让英国人完全享有中国人所设想的内债将会带来的财政优惠,以求在这一问题上同英国达成协议——顺便说一下,是在今年1月14日您的呈文案草案所说的条件下。这样,我们得以按照皇上的旨意,在远东问题上同英国完全友

① 1898年1月14日高等文官维特起草的奏折草案。

② 驻北京的俄国公使。

③ 1898年1月27日外交大臣致财政大臣的密函副本,第50号。

好相处。^①

在我们所引用的文件中,俄国外交方面的让步倾向十分明显。英国外交方面认为这是向俄国建议友好分割守卫不严的中国领土,把它分为相应的地区或势力范围的合适机会。在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 1898 年 1 月 19 日的奏折中,我们看到这样的话:“几天前来拜访我的英国大使……就俄英之间在远东以及在东亚事务中可能达成完全的谅解,谈了一些想法。按照索尔兹伯里(Salisbury)侯爵的意见,假如我们表明准备接受俄英相互关系的一个解决办法,即一定程度上明确划分双方在中国以及在土耳其的势力范围,并且互相承担帮助和支持的义务,那末这种谅解就能够达成。我要冒昧地说,索尔兹伯里侯爵的建议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划分双方在华的势力范围,值得重视。实在,在目前政治形势下,鉴于我国分舰队舰只业已占领旅顺口和大连湾,对于我们说来,同英国达成友好协议——按照索尔兹伯里建议划分在华势力范围,即以黄河为我国势力范围的东部界线,而以扬子江流域为英国势力范围的北部界线,乃是上策。^②目前这种协议将使我们在直隶湾^③内享有充分的行动自由,可以排除英国人对北中国事务的任何干涉。假如皇帝陛下赞成这些意见,那我一定……仅就索尔兹伯里侯爵的建议所涉及的中国部分,进一步同英国大使交换意见。”

1 月 28 日英国大使拜访俄国(外交)大臣,再度提出协议的问题。1898 年 1 月 29 日外交大臣奏折的结尾部分说:“我提请大使注意,欧格讷(N. O'Connor)^④先生应当促请伦敦尽快通知我们更加明确的纲领,以作为俄英之间未来协定的基础。尽管我当时并

① 在穆拉维约夫伯爵的信上有尼古拉(Николай)二世的御批:“可惜,我不相信同英国的这种交易会有圆满结果,不相信我们在远东的全部利益将得到维护。”

② 参见古奇、坦珀利编:《关于大战起源的英国文件(1898—1914)》,第 1 卷,伦敦 1927 年版,第 2 页。——译者

③ 即今渤海湾。——译者

④ 英国驻彼得堡大使。

没有忘记向英国大使强调,商讨远东事务是当务之急,但欧格讷先生显然仍认为有必要就土耳其东方问题同我们达成可能的协议表示一些意见。这些意见非常重要,值得重视。英国大使声明,在划分土耳其势力范围问题上,俄国要求俄国势力范围内不仅有黑海及其沿岸地带和博斯普鲁斯海峡,而且有“爱琴海的出口”,英国准备承认这项要求完全合理;同时补充说,目前英国的全部利益主要集中在非洲大陆。英国大使最后还说,英国政府关于两国之间可能达成协议的观点——他,欧格讷,已经通知穆拉维约夫伯爵,想来穆拉维约夫肯定已奏报皇帝陛下,因此,更加准确、详细地确定协议纲领的时机现已来临。我没有对大使的看法提出异议,欧格讷先生的整个谈话使我深信,他本人显然完全赞同俄、英接近,并竭诚地准备促进这种接近,于是我请求他,为了避免任何误解,假如有可能的话,以完整的纪要或备忘录的形式,书面叙述英国政府的观点和要求。”

关于开始谈判的情况,外交大臣通电驻伦敦的俄国大使说^①:“这里的英国大使受其政府的委托通知我说,詹姆士内阁无论在远东问题或是在土耳其东方问题上都准备就一定程度上明确划分双方在中国和土耳其的势力范围,并就双方承担互相帮助和支持的义务,同我们达成协议。索尔兹伯里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已由我伏呈皇上圣裁。皇上满意地向英国大使表示,完全赞同英国政府的建议,并说,远东问题现时急需商讨。鉴于此,我们希望索尔兹伯里立即通知更为实在的纲领,以作为俄英之间未来协议的基础。”

1月31日,英国驻彼得堡大使向外交大臣递交一份关于拟议中的协议问题的备忘录。可惜,我们不能引用这份备忘录的原文,因为至今在旧外交部的案卷中没有发现它。

但是,从已引用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文件中可以看出,英国外交

^① 穆拉维约夫致斯塔尔的密电草稿(未注明日期)。

方面最初是野心勃勃的，英国人打算缔结一揽子协议，不仅包括远东问题，而且包括近东问题。不过在近东问题上绝无希望，谈判只在远东政治方面展开了。早在欧格纳第一次拜会之后，穆拉维约夫就为谈判预定了显然有限的范围。就在第二次奏折（1898年1月29日）的边页上，有尼古拉二世的御批：“目前我们同英国的谈判只能涉及远东问题。”看来，英国人没有坚持其最初的一揽子建议，欧格纳第二次拜访已经同中国借款的具体问题联系起来了。我们从那份奏折的以下一段文字，可以知道这一点，这段文字说：“昨天，英国大使前来拜访我，又一次抱怨说，我们似乎阻碍了英国订立中国借款契约，并为此目的力图用威胁手段对北京政府施加影响。然而，据欧格纳说，伦敦却非常重视中国借款问题，主要因为许多英国小资本家已经准备把自己不大的资本投入这项由于俄国的坚决阻挠而未能实现的事业；另一方面，地方报刊也就利用这种情况，把纯粹财政挫折归于政治方面的原因；各家报纸纷纷评论英国在华政策的失败，并以俄国对远东不断增长的政治影响来说明这一点，从而愈来愈刺激英国人的民族感情。欧格纳补充说：这种情况可能使……英国政府处于很困难的境地……因此，欧格纳吁请我们协助英国政府以某种方式消除英国国内对政府的这种不良印象，帮助索尔兹伯里摆脱目前的困境。对此，我首先向英国大使表示，对于中国人用以解释英国政府关于伦敦借款谈判不成功的原因的报道不应过分相信，因为清帝的大臣们曾经用完全相同的理由向我国驻北京的代表解释，说英国曾以种种方法和威胁的手段阻碍俄国订立中国借款。我补充说，这种情形最好不过地证明，假如我们之间达成索尔兹伯里侯爵创议的、得到……皇上赞同的协议……，那么俄英之间发生的类似上述种种误会就不难获得双方满意的解决。从我坦白的解释，詹姆士内阁不难发现，我们不认为俄国订立中国借款有太大的意义；相反，假如我们深信，英国政府关心中国借款只是从投放本国资本家的股票的观点出发，即把它视为纯粹的金融活动，那毫无疑问，俄国不仅不会阻挠英国资本

家订立借款，而且也许能对英国订立该借款助一臂之力，但当然必须有条件，即英国不得向北京政府提出对我们的利益可能有损害，或是同中国早已对俄国承担的种种义务相抵触的那样一些要求……。”俄国外交部门无疑认为1月31日的英国照会有巨大意义。我们在1898年2月2日的奏折中看到这样的话：“英国大使的正式照会，叙述了伦敦内阁关于俄、英之间在土耳其以及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问题上的意见，是一个头等重要的文件。这项由驻圣彼得堡的英国代表签署的英国政府重要照会，既丝毫不束缚我们行动的自由，又预先确定了某种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将来可能对我们有极重要的意义。”穆拉维约夫在那份奏折中写道：“我一定首先向欧格讷声明，英国大使的照会表明英国恰如其分地确认了我们在北部占据优势地位的权利，因此，我方准备容许英国在中国南方的势力。”

1898年2月2日，英国大使向俄国外交部递交一份备忘录，列举英国在中国问题上要求的一些基本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扬子江地区的任何部分不割让给外国人。

外交部同财政部商妥，并得到维特的指示（即首先坚持俄国在满洲修筑铁路支线和占有旅顺口），答复英国人说，他们建议的原则方面完全是互惠的，并把自己的答复记录在1898年2月10日递交英国大使的一份特别照会中：“我国君将这份备忘录（指1898年2月2日备忘录）看成是英国政府愿意同帝国政府达成某种协议的新证据；这一协议有助于消除两国之间在其有利害关系地区的种种磨擦和纠葛。皇帝高兴地接受这种想法，但认为这种想法在目前最适用于远东事务，包括中国借款问题；借款问题目前正是双方内阁特别注意的课题。”^①

再早，有一次同欧格讷会见时，拉姆斯道夫（Ламздорф）把欧格讷的思想由总的协定引到局部问题，他那时说：“我们在借款的

① 译自法文。

局部问题上达成协议，可以成为检验我们将来在更广泛的纲领上所持观点和行动是否一致的试金石。”^①

俄国外交方面赞成关于借款问题达成协议的理，基于下面一些想法：在当时，虽然中国人倾向于拒绝外债（他们对英国人说俄国的威胁阻碍他们向英国借款，反过来，对俄国人又说英国阻碍他们向俄国借款），但无疑，北京政府要借内债是办不到的；在此情况下，“就可以容许英国向中国人提出那些可能为中国人所接受而又既无损于中国、也不触及我国在华利益的借款条件”；“容许”中国人同英国自由进行借款谈判，并迫使英国人“放宽”借款条件，俄国外交即能以中国利益保护人的身份出现，由此，它就能要求清政府“答应租借旅顺港和大连港，甚至答应租让与旅大港连接的铁路线”，以“换取这一效劳”。关于这一点，拉姆斯道夫指出：“有了这一步棋，只要中国不通过俄国而向任何一个欧洲大国借外债，我们首先就可以避免由此可能产生的各种麻烦”；自然，审查英国的条件只能是“从我们的政治和财政利益的观点出发”，也就是说，“我们同英国在上述范围内的协议必须保证我们在中国北方的根本利益”。这一切绝不会危害俄国和法国的相互关系，因为在中国北部，法国毫无利益可沾，而“在划分法国和英国在华南势力范围的问题上，我方未必插得上手”。这些理由包含在副大臣 1898 年 2 月 2 日节略中。看来，从这时起，谈判可以开始了，并且也有了具体的、实实在在的基础。

其实，英国人在借款的具体问题上有其自己的打算，期望使俄国政府面对既成的事实。至少，俄国驻北京公使 1898 年 2 月 15 日的电报报告说，中国政府恢复了同汇丰银行关于一千六百万英镑借款的谈判，条件同去年春天银行提出的一样；那时这些条件曾为中国人拒绝。事情在赫德(R. Hart)与张荫桓之间进行得极其秘密，看来，此事与张荫桓个人有着利害关系。俄国政府虽然坚持首

^① 1898 年 2 月 7 日拉姆斯道夫的奏折。

先在借款的局部问题上达成协议，但此时它正忙于办理关于租借港口和关于租让中东铁路南部支线的条约，因而不急于继续进行谈判。

结果，谈判进展极其缓慢，时断时续，形同讨价还价。

中国原来也不不知不觉地被拉进了谈判。1898年7月，巴甫洛夫得以与总理衙门交换照会，照会商定：山海关——营口铁路不能作借款的担保，不容许铁路业务的外国财政监督。俄国（外交）大臣向雷萨尔解释说^①：“由于这样提出问题，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中国的行动自由。”同时外交大臣强调指出，“我们维护本国利益的意图，不能，也不应该引起英国方面的担心”，俄国应该以通知英国公使补充议定书第三款^②的事实取得英国的好感。当初俄国占领关东时，伦敦政界曾为之惶惶不安，这一点，斯塔尔在1898年1月就已报告过了。如今，到了7月，雷萨尔报道伦敦又出现这样的政治恐惧。外交大臣委托雷萨尔“以和解的精神”向英国内阁作适当的解释，他在1898年7月29日的电报中指示雷萨尔说：“鉴于英国人在山海关到营口的铁路延长线问题上对我们的激烈情绪，必须记住，我们决不反对中国人建筑上述铁路，也不反对为此目标的任何借款。我们同清政府缔结协议，只是为了预防以任何方式把事业转移到外国人的手中。此举是出于在俄国天然势力范围内保护俄国利益的通情达理的动机。我们不怀任何不可告人的野心，并仍然继续深信，我们在满洲的活动为外国人开辟了新的投资场所，只能对共同的利益起好作用。”

1898年7月31日雷萨尔的报告向我们展示了谈判的进展情况。报告说：“几小时以前，接到现在主持外交部的巴尔福（Balfour）的邀请，要我今天去看他。他提请我注意舆论的激昂情绪，并且对于春天误会之后已缓和的关系又尖锐起来表示遗憾。他几次

① 1898年7月29日外交大臣致驻伦敦俄国外交代表雷萨尔的电报。

② 关于西伯利亚铁路干线同旅顺和大连湾连接，关于不对外国人提供这一区域的铁路租让，关于俄国同意不阻碍用中国政府的资金建筑山海关铁路。